

Z名家名笔

敦煌与文学

陈彦

我有幸多次来敦煌参观学习，每次都有一种特别的激动感。有时来，甚至并没有看到莫高窟壁画，就是开会，谈事，甚至路过，但依然能感到自己是在一个神秘而又神圣的地方驻足、沉浸、穿越，这里积淀着数千年深厚的文化、文明，也见证过世界东西方政治、经济、文化、宗教、商贸的无数次凿空之旅与纷至沓来的历史和人物。当然，也历尽了铁马金戈的大地踏破与山河复还，这是中华民族的一个重要历史关隘，是中华文化吸收外来文化熔铸的辉煌一页，也是架通千百年来世界桥梁的一个恢宏驿站。敦煌学，是一门世界显学，我想除了历史的界面，对于现实与未来，同样具有不可撼动的文化地位与精神意义。

文学，天然地与政治、经济、历史、文化、宗教、商贸，甚至军事水乳交融。在我的认知里，她是包容着人类、自然、天地、宇宙、古今一切存在事物的一种综合度极高的表达形式，哪怕是书写一颗孤独的灵魂，那里面也有世界消息、人间万象、文化传统的天然折射。文学的本质是写人的，而人正是大世界与小社会的综合

结晶，其精神可以因感知天地消息而无限开阔，也可能因困于个人的认知局限而极为逼仄，就像莫高窟当年的看护王道士，他的认知、他的判断，是一个国家在积贫积弱的衰败时期的综合反应。他无法认识自己所面对的民族灵魂与历史瑰宝恒久的精神价值和长远的文化意义，只能做出形而下的深感划算的物质交换。正是因为有了王道士所昭示的敦煌史上难以弥补的缺憾，文学对于人的提升价值就显得尤其可贵而重要。我们可以不书写浩瀚宇宙与马里亚纳海沟，不书写战争与和平，甚至不直接书写历史与现实，但我们仍然需要有尽可能开阔的视野，有足够的文化和精神自觉，从而在书写一个人的心灵史抑或是各种悬疑、科幻中，具有一种洞穿人类共同进程的密码与钥匙。文学应该关注大的东西，哪怕落笔很小很细，大的关切都是那个细小的最后张力。身处中西文化交汇之地，见证千年历史沧桑，容纳文化、精神和艺术丰富经验的敦煌，正是可以开阔心胸，拓展眼界的重要所在。

文学是一个民族的心灵史、精神史和灵魂史，我们在敦煌历史与艺术中，需要深刻体悟有关文学的生存发展之

道。这段历史和它创造的辉煌艺术生动地告诉我们，开放、吸收、借鉴、融合、自创、自洽，是一个伟大民族的高远眼光与博大襟怀。任何借鉴与吸收，最终都应在本土生长出适合繁衍的种子与生命来。一如俄罗斯的文学艺术，在18世纪后半叶和19世纪初，完全是欧洲、更具体地说，就是法国文化的翻版。读法国书、唱法国歌、演法国戏、奏法国乐、说法国话、穿法国衣、吃法国餐成为一时之盛。以普希金、托尔斯泰、契诃夫、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柴可夫斯基、列宾为代表的一批文学艺术家，觉得不能再这么干了，再这么干下去，俄罗斯连世界“二等公民”都不如。由此，开始了向民间文化这口深井钻研的旅程，也就是向内求，寻找俄罗斯灵魂，寻求俄罗斯表达，开辟文学艺术的俄罗斯性，进而将外来文化融会其中，完成民族新文化的独异创造。在敦煌这块土地上，文化、艺术、宗教都曾有过本土化的落地实践，更有属于中华民族的生命活性原创，因此，文学在这里，天然应该得到更多启示，从而激活如此丰沛的历史和地域元素，成长为起形貌壮丽的参天大树来。

文学是扎根于现实大地上的璀璨的想

象花朵。在敦煌这块土地上，现实是如此厚重、博大、真切地存在着，一窟一沙，一草一木，都饱蘸着历史过往的深重记忆和动人心魄的文化内涵。但在我心中，敦煌的想象空间，比这个载厚的现实更加辽阔、奔放而旨远。我总觉得这里是能出伟大作品的地方。具备了天地交泰、历史沧桑、人间悲欢、现实新变、自然丰茂的所有文学书写要素。我国的“四大名著”，包括司马迁、蒲松龄，也包括马尔克斯、博尔赫斯、卡尔维诺，甚至科幻作品《沙丘》等的书写形态，都能在这里找到深切的对应和进一步打开的无限可能。无论从哪个方位进入，我们似乎都能充满期待。很多作家也正在攀登这个高峰，今天的“一带一路”壮举，正在书写着比历史更加充满自觉性，也更具人类命运共通意义的现实新篇，我们惊喜地看到文学之于敦煌，始终在场在位在线。如何将我们的想象力打开到历史与现实所具有的高度、宽度与深度，甚至更高更宽更深，进而创造出足以表征时代的华彩巨章，那就是中华文学的福音。这个铿锵足音我们一定会听到。

(作者系全国政协常委，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

Z委员笔记

今年9月初，我随全国政协文化文史和学习委员会“推动城乡建设中的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党外委员专题视察团到四川省视察，第一站便是素有“巴蜀第一县，蜀国第二都”之称的昭化古城。

第一次来到昭化古城，禁不住被古蜀文明之“古”所折服。保存完整的古驿道、古关隘、古城墙、古庙宇、古民居、古墓祠、古桥古井、古街古巷，古风古貌、古色古香。正如一首诗所描写的：“古城昭化翠影横，流水悠悠古巷深。石板街巷凝岁月，斑驳斑驳见沧桑。古塔擎天入云汉，红墙碧瓦寄乡愁。古道婆娑风吹过，柳垂丝丝古韵留。”

昭化古城，位于四川省广元市昭化区昭化镇，白龙江、嘉陵江、清江三江交汇处，四周环山，三面临水，素有“天下第一山水太极”自然奇观之美誉，也是“全蜀咽喉、川北锁钥”之战略要地，是国内目前保存完好的三国古城。昭化古称葭萌，公元前316年，秦国灭蜀吞巴并苴，在成都建立蜀郡，在苴国区域建立了葭萌县，因此称为“巴蜀第一县”。蜀汉章武元年（221年），刘备在成都建立蜀汉政权，葭萌成为蜀汉政权的龙兴之地，被视为“蜀国第二都”。故有“蜀汉兴、隆中谋、葭萌起”的说法。张飞挑灯夜战马超，黄忠、严颜退曹军和姜维兵困牛头山，《三国演义》中的许多故事均发生在这里。宋开宝五年（972年），宋太祖赵匡胤颁布旨“昭示帝德、化育民心”，把葭萌改名昭化，昭化由此得名。

走在昭化古城的每一条街巷，脚踏着每一块石板，抚摸着每段驳的城墙，那些历史传说中的人物在串串遐音之中仿佛鲜活地出现在面前。正步聆听古城原住民地道乡音的吆喝声，仿佛古城依然用它最安逸舒缓的节奏，诉说着自己的历史。

在千年古城——阆中古城，我们感受到了中华文明在此留下的厚重历史与今天焕发的勃勃生机。阆中是中华民族本源文化的发祥地之一，是巴人文化、风水文化、三国文化、科举文化、天文文化、宗教文化、民俗文化、红色文化的聚集地，古城保存了大量明清时期的古民居院落和历史街巷，展现了“天人合一”的至善境界，素有“风水宝地”“阆苑仙境”“嘉陵第一江山”之誉。在阆中古城学道街的川北道署，衙署规制严格，第二重正门为礼门，意为礼仪之门。礼门联云：“与百姓有缘，才来此地；期寸心无愧，不鄙斯民。”此联为清代诗人余小震任三防主簿时在衙门所作，寓意为将自己到访地做官看作是与当地百姓的一种缘分，表示为官要清正爱民，对得住自己的良心，不鄙视和欺侮百姓。在礼门与大堂之间，有一座“公正明”石牌坊，朝大堂的一面镌刻有黄庭坚所书《御制戒石铭》：“尔俸尔禄，民脂民膏，下民易虐，上天难欺。”官员进出或坐堂理事，抬头可见牌坊十六字铭文，以提醒其秉公办事，若徇私枉法，天理不容。

在这里，能时刻感受到千年古城的历史韵味。让人印象深刻的，是，在汉桓侯祠，也是蜀汉桓侯张飞的墓祠，阆中人念其生前忠厚，遗惠百姓，自蜀汉始建有祠庙祭祀，“土宇几更，墓田如故”，至唐代建张侯祠，明代称雄威庙，清以后更名桓侯祠。站在十字楼上，眺望古城东西南北，阆中巍峨尽收眼底，伏羲像前，领悟“天心十道”之意，犹有“山川灵气成长镇，文物流风蔚大观”之势，真乃“江水流悠，问张爷岳婿这般肝胆谁人再，山岚阵阵，叹吴道袁墨此等风光何处能！”

最难忘的要数考察三星堆博物馆了。时隔多年，再次来到三星堆，精神为之一振。近年来三星堆遗址考古发掘取得重要进展，今年7月，考古工作者在三星堆遗址新发现了与玉石器生产加工相关的遗存，经专家初步判断为玉石器“生产车间”，年代为商代中期，距今约3500年至3400年，比三星堆祭祀坑的埋藏年代更早。

1986年，两座祭祀坑的发现使三星堆“一醒惊天下”。其中出土的大量青铜群像，让三星堆在青铜器文明中显得辉煌而独特，被称为“20世纪人类最伟大的考古发现之一”。三星堆遗址以鲜明的地域特征和复杂的文化面貌，证明了古蜀文明在历史上的真实存在，再次说明中华民族和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家国一体的形成发展过程，揭示出中国社会赖以生存发展的价值观和中华民族日用而不觉的文化基因，为世界文明交流互鉴提供了推动力。

与此同时，三星堆古城遗址众多未解之谜也使三星堆文化研究充满挑战和吸引力，吸引着无数研究者的深入探索。

更有价值的是，金沙遗址的发现对蜀文化起源、发展、衰亡的研究有着特殊的重大意义。金沙遗址不仅再现了古代蜀国的辉煌，而且与成都平原的史前城址群、三星堆遗址、战国船棺墓葬共同构建了古蜀文明发展演进的四个阶段，共同证明了成都平原是长江上游文明起源的中心。特别是2001年出土于金沙遗址的太阳神鸟金箔，不仅因其精湛的工艺和丰富的文化内涵闻名于世，而且成为古蜀文明辉煌的有力见证。可以肯定的是，三星堆遗址与金沙遗址都是古蜀文明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展示了古蜀文化的连续性和继承性。金沙遗址的发现为破解三星堆文明突然消亡之谜也提供了另一视角的实证依据。

三星堆文化就像中国历史长河中的一个分支，让我们再次感受中华文明的强大兼容性和源远流长。三星堆遗址仍有诸多未解之谜，这些千古谜团更为后世留下无尽的遐想。

(作者系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国际城市发展研究院创始院长)

古城观止

连玉明

Z烟火人间

岁岁重阳 今又重阳

刘笑伟

定为“老人节”，为德孝文化传统赋予了新的时代价值。

军人是最应该思考和践行尊老爱亲的一个特殊群体，因为军人们的职责和使命决定了要远离家乡，远离父母，远离亲人，在特殊的战位上履职尽责。

在西藏走边防的日子里，我听到的震撼人心的故事有很多很多。

某日，老兵去迎接首次探亲的爱人。在火车站，爱人与他擦肩而过却没有相认——戍守在高原久了，老兵的肤色已变，容颜已改。

爱人临产，老兵因为大雪封山而不能返家。某次，他执行任务的列车要经过家乡小火车站，却并不停留。爱人只好抱着孩子提前在站台上苦等。当列车经过时，高高举起孩子，以解老兵思念之苦。

还有很多类似的故事。

当年驻守高原的条件远不如现在，就以运输条件和通讯条件为例，当年还没有修成今天这样多的公路、铁路，运输要靠牲畜和人力，也没有手机，甚至电话线也常常因为天气恶劣而中断。大雪封山之时，一封就是几个月甚至半年。在这段时间里，官兵们靠储存的给养保障，靠书信与家人联络。官兵们最盼望的就是随给养保障车一起送来的家信。那个时候，“念家信”成为官兵娱乐生活的一部分——战友们都是生死之交，是没有什么私事可以隐瞒的。

我至今仍然对当年在《解放军报》文化部工作时编辑的一篇散文记忆犹新。这篇散文作者是著名作家裘山山，发表在《解放军报》长征副刊上，题目叫作《查果拉的鲜花》。散文讲述了她和几位作家被汽车载上了海拔5380米的查果拉，见到了坚守在那里的生命群体——查果拉哨所的全体官兵。文章写道：“因为我们是从营部上山的，便为战士们带去了他们这段时间的书信和报纸。其中排长李春的信最多，有三封。于是大家要李排长交待，都是谁写来的？李排长从实招来：一封是父母大人的，一封是战友的，还有一封，他的脸红了：是未婚妻的。战士们立即起

哄，要求李春公布情书。出乎我的意料，李春爽快地同意了。于是，我有幸在海拔5000公尺的高山上，在荒凉得不生寸草的地方，读到了一封感人至深的情书。情书的作者是位女大学生，她与李春通过发表文章成了笔友，进而成了恋人。就在我们去的时候，她已经从家里出发，先后乘火车、飞机、汽车向查果拉抵近，要在海拔最高处，举办一场婚礼。我想说，这是我听到的最美的爱情故事。”

于是，接下来，作家刘醒龙“喘着气为战士们唱了《小白杨》”，作家王曼玲一边吸氧一边为战士们宣读了李排长的情书，“让战士们开心得嗷叫”。

这篇散文，生动地记录了当年西藏军区的边防官兵们艰苦的生活条件和以苦为乐的精神风貌。

回到重阳节这个话题。重阳节还寄寓着人们孝老爱亲的美好心愿，体现着中华民族追求团圆的价值取向，寄托着全体人民希望国泰民安的共同期盼。所以说，重阳节也是尊老爱亲的节日。每年的重阳节，在高原戍守边防的官兵们，一定会登上雪山之巅，眺望着家乡的方向。2024年新春佳节前夕，在中央军委慰问驻京老干部晚会上，有一个节目——《战士的远方叫家国》，道出了官兵的心声。演唱前的“串词”部分，一位战士在日记中写道：“家乡在我身后，直线距离3028公里，那里的树现在很绿”。是的，每逢佳节，每一位战士都牵挂着家乡的父母，家乡的亲人。因为使命在身，他们不能在家中尽孝，所以只能把对亲人的思念，深深地埋藏在心底。所以，这首歌曲开始唱道：“哨所入星河，钢枪不言说。眼前是万里山河，身后是万家灯火”。这首歌最后唱道：“战士的远方叫家国，火热的青春不蹉跎。强军号角召唤我，逐梦的征途多壮阔”。可以说，道出了戍边官兵的心声。

在青藏高原上，我们走了一座又一座边防军营。在那里，因为海拔过高，官兵们的父母来军营探亲的为数并不

多。每当战友们有亲人来到军营，官兵们总是为他们献上洁白的哈达，用最热烈的仪式欢迎亲人们的到来。

我写下《雪山的重阳》这首诗，也是为在高原上戍守边防的官兵们表达一下心声。他们牵挂家乡的父母，更牵挂祖国的山河。他们穿上军装后，牢记亲人的重托，每时每刻都在仔细察看祖国的每一寸边境线……

每年的重阳节，战士们要替父母登高望远、祈福健康。在节日里，虽然不能回家尽孝，但他们却带来了祖国万里河山的一片祥和、万家团圆的无限温馨。家是最小国，国是最大家。这样的境界，正是像雪山一样高、像天路一样辽远的中国军人的精神境界。

作为一位有着30多年军龄的军人，我写过这首关于重阳节的诗。对重阳节的理解，也尽在其中了。现在重新读过，别有一番感慨。俗话说，“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能够把“铁打”与“流水”有机结合起来，就是人民军队的光荣传统与核心价值理念。从这个意义上说，军人的重阳节也是铁打的——因为军人的家国情怀，正如钢铁一样坚不可摧，巍然屹立在每一位中国军人的心间。

(作者系全国政协委员)



这首诗，触及了重阳节的另一个主题：尊老爱亲。在古代，重阳之际，人们虔诚祭祀，向天地和先祖表达感恩之情。慢慢地，重阳节便有了尊老爱亲的文化内涵，这无疑是中华传统文化中值得弘扬的一部分。1989年，我把每年的重阳日